

第九卷

Vol.9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第九卷)

Vol. 9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公共管理评论》是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学术出版物。第九卷共收录7篇论文、1篇评论以及7篇书评。所收录的论文反映了国内外公共管理最前沿的一些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文化基因、中国基层选举、中国公用技术人员终生收入期望分析、跨界应急管理协作、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驻京办问题研究、电子政务文献研究等问题。评论1篇是关于中国行政改革措施的廉政作用的文章。书评是对5本译著和两本外文著作的介绍和评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管理评论. 第九卷/巫永平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7
ISBN 978-7-302-22939-1

I. ①公… II. ①巫… III. ①公共管理—文集 IV. ①D0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1691 号

责任编辑:周 菁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国马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80×255 印 张:14 字 数:299 千字

版 次: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30.00 元

产品编号:038250-01

目 录

论文

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文化基因(二):物竞	梁鹤年	3
由村到镇的思考:中国基层选举的结构性问题与香港地方选举的比较	沈旭辉 陈伟信	56
公用技术人员终生收入期望研究	胡乃军	68
使跨界应急管理协作运转起来:美国 EMAC 的经验及其借鉴	吕志奎	86
凯恩斯计划、美元本位与特别提款权改革——兼谈对我国的公共政策含义	纪 锋	112
基于选择性政策的“驻京办”及其运行模式	殷存毅 汤志林	129
电子政务研究回顾 1999—2009:基于 SSCI 文献的分析	张 楠 孟庆国 郭迅华	143

评论

中国行政改革措施的廉政作用	程文浩	165
---------------	-----	-----

书评

德尼·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	雷尚清	177
米尔顿·缪勒:《控制根: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的驯服》	王东宾	184
丹尼·罗德里克:《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	王东升	192
阿马蒂亚·森:《正义观》	成福蕊	197
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	康晓琳	203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战建华	207
库尔特·多普菲、杰森·波特:《经济演化的一般理论》	冯 焱	213

CONTENTS

Articles

- Cultural DNA of Western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2): Competition
Leung Hok-Lin 3
- Comparison between Structural Issues in Village-level Elections in China and
Regional Elections in Hong Kong Shen Xuhui, Chen Weixin 56
- Research on Life-cycle Income Expectations of Publicly Employed Intellectuals
Hu Naijun 68
- Making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Work for Managing Emergencies: A Study
of the U. S. Emergency Management Assistance Compact Lv Zhikui 86
- Keynes' Plan, the Dollar Standard, and Special Drawing Rights Reform Ji Feng 112
- A "Beijing Liaison Office" and its Operating Mode based on its Selection Policy
Yin Cunyi, Tang Zhilin 129
- Review of E-Government Research 1999—2009: A Literature Study Based
on th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Zhang Nan, Meng Qingguo, Guo Xunhua 143

Comment

- Analyzing the Anti-Corruption Function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s
Cheng Wenhao 165

Book Reviews

- Denis Goulet: *Cruel Choice: A New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
Lei Shangqing 177
- Milton L. Mueller: *Ruling the Root: Internet Governance and the Taming of
Cyberspace* Wang Dongbin 184

Dani Rodrik: <i>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i>	Wang Dongsheng	192
Amartya Sen: <i>The Idea of Justice</i>	Cheng Furui	197
Steven N. S. Cheung: <i>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i>	Kang Xiaolin	203
Karl Polanyi: <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i>	Zhan Jianhua	207
Dopfer K & Potts J. : <i>The General Theory of Economic Evolution</i>	Feng Yao	213

论 文

誓,决意进修道院。朋友们力劝无效,两周后他离开学校。朋友们送到修道院门口,他回过头说:“今天一别,后会无期。”这位少年是22岁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这事情发生在1505年7月2日。路德终有一天反悔他的誓言,但整个西方世界就因为他出家的选择而面目全非。

其实,路德出家并不是完全意外。他生于非常虔诚和严谨的家庭。父亲想让他念法律,他却改念哲学,但越念越觉理性只是教人畏神,并没有显示一个爱人的神。他恐惧死亡,更恐惧神的审判。可以说,他出家是要解决他个人的信仰危机。他很努力地祈祷、守斋、忏悔、朝圣,但得到的却是沮丧、失望。“我未有接触到救世和慰藉的基督,我把他当做我的监狱长和行刑官。”他越努力修行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院长认为他过度内省和自责,命他再进大学修读,分散他极度低劣的心情。他于1507年重回学府,1512年获教席。

他对教义的僵化和教会的腐化很失望。1517年,罗马教皇要修圣彼得大教堂,卖“赎罪券”筹钱(见《源头》一文),路德怒极了,写信给当地主教抗议,并列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95条论辩提纲。10月31日那天,他把副本钉在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教堂门口。改变世界、开展“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就在那天揭幕。

路德对自己的人性是悲观的,具有强烈的犯罪感。他日后悔誓、娶妻,他的解释是,誓言是“被迫的”,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反应,应属无效。进修道院后晋升神职所需立的贞洁之愿也应属无效。他反对神职的誓言是终生性的,他反对神职人员不娶(这是新教牧师与天主教神甫的一个大分别)。他力图“征服”他堕落的人性,但终觉有心无力,只能期待神恩。改革运动、日后的基督新教以至整个西方文化都深受这种犯罪感和人性悲观的感染。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不是政治改革,但它带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需要和可能。宗教改革产生出新的宗教(但大家都自称是基督之教、基督之徒)和新的宗教地图(宗教在地理上的分布)。宗教地图有其政治意义,也就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当初是世族王朝之争。但不能不动员小贵族、大商人和老百姓。渐渐的,小贵族、大商人、老百姓也想多些权、多些利,宗教热忱被利益替代。世族王朝与小贵族、大商人、老百姓的妥协、互利,慢慢产生以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渐渐出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制衡。

宗教改革(16世纪)带出启蒙运动(17、18世纪)。宗教自主(王侯们的自主)引发绝对君权,然后带出社会契约。但这些都离不开西方人对“真”的定义和追求^①。西方从“现代前”的精神文明一统走上“现代”的精神文明分裂。宗教改革产生了保守(天主教)和改革两派,改革又分裂为温和与激进。温和改革和激进改革互相视对方为异端。跟着政治介入,引出百多年的、说不清的欧洲大混乱。

^① “真”是指“真实”,也就是“真正的事实”,以别于“虚妄的现象”。“求真”是对“真”的认识和辨别,也就是“追求真的知识和真的道理”。因此,“真知”与“真理”都是“求真”的对象。

宗教改革由马丁·路德开始,两个星期后消息传遍德国(它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约有200个大小侯国和封地。见《源头》一文有关神圣罗马帝国)。与此同时,瑞士也蠢蠢欲动,领头的是瑞士的茨温利(Zwingli,1484—1531)。这些改革分子在当时通称“誓反派”(Protestants,也是现今所有新教教派的英文通称,中文译作“更正教”,在中国“基督教”通常专指新教),但他们的身份仍是天主教徒。茨温利派的部分信徒认为路德的改革太保守,成为激进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认为婴儿受洗无效,应成年时再受洗)^①。从此,改革又分为温和派(如路德派)和激进派(如茨温利派、加尔文派)。

茨温利生于瑞士民族意识开始抬头之时。他是教士,但不满天主教会的腐败,反对当时的崇拜偶像的倾向^②,并主张教士可以结婚。上述的“再洗礼派”是从他的教派分裂出来的更激进分子,最后茨温利还带头去迫害“再洗礼派”。

一般来说,宗教改革其实是宗教复古。温和改革派想回到中古前奥古斯丁时代的天主教会。激进派认为这还不够彻底,他们要回到原始的天主教会。但在激进改革中最具影响的是法国的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但主要基地在瑞士),他没有“再洗礼派”那么激进,他的理想是一个比较朴素的教会,特别反对教会的奢华风气和偶像崇拜倾向。其实,加尔文派的教义与路德派相当接近。但很快地,两派信徒反目,温和路德派和相对较激进的加尔文派之间的斗争比他们与天主教的冲突更尖锐。

路德于1521年5月被逐出天主教会,这是神圣罗马皇帝下的旨意。教皇同时通谕谴责改革分子。高涨的宗教情绪马上政治化,出了大乱。激进改革派的争端是婴儿洗礼。他们想得到路德的支持。路德秘密会见这些代表,但很不认可他们的见解,把他们赶走,并在路德派势力的地区内驱逐这派的信徒。这些激进改革派没有教堂可用就在私人家里做仪式。他们不能在城镇立足就涌到农村去。他们的首领闵采尔(Thomas Münzer,约1489—1525,曾追随路德)在德国中南部和瑞士到处宣传,他的政治和宗教言论越来越激烈,信徒(特别是平民和农民)越聚越多。他们反对所有旧制度,要建立一个完全平等、完全公产的基督国度。农民战争遂起(1524—1525),战事蔓延德国中、南、西部与部分奥地利和瑞士。参与的农民约30万,死亡人数约10万,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最大的一次平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宗教情绪撩动的阶级战争。

宗教改革在神圣罗马帝国辖下的德国开始。当时,德国社会上的6个阶层(王侯、低级贵族、教士、豪族、中产、平民)按宗教分为三派:①以教士和保守的豪族和王侯为核心的天主教会,他们是宗教与政治的保守分子。②以中产和王侯为核心的路德温和改革派。中产阶层希望夺得市政权力,因为路德建议的新教会是以城镇为核心和高度集权,并谴责豪族按家族利益操纵市政。王侯们则希望从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廷那

^① 路德派跟当时的天主教会一样,主张婴儿出生就可以并需要受洗。从茨温利派分裂出来的激进的“再洗礼派”分子认为这不合《圣经》和原始教会的教义。他们指出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成人后才在施洗者——约翰处受洗的,因此,反对婴儿受洗。

^② 改革派认为对圣人的崇敬,特别是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敬,几近崇拜偶像。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偶像”的演绎上分辨出新教和旧教(天主教)。新教的十字架上没有悬挂耶稣。但天主教的十字架上就有耶稣在上面,被称为“苦像”。

里更多地得到自主权。^③以平民、农民和他们的同情者(包括低级贵族)为核心的激进改革派,他们想打开枷锁,重新建立一个神的国度。

1524年,战斗在德国西南部斯瓦比亚(Swabia)开始起,很快就蔓延到德国各地。各国城邦和小国纷纷向大的王侯们求救。路德支持统治者有权镇压暴乱。他支持“君权神授”的论点,认为所有俗世权力是神授的,子民不应反抗。王侯们以武力很快(1525年5月)就恢复旧秩序。平息叛乱大大增加他们的权威,也大大撩动他们日后以宗教战争扬威、争利的野心。对众城邦和小国来说,这些王侯们的威胁往往比神圣罗马皇帝难受得多。但激进改革却并没有被压止,并继续蔓延和加强。

面对改革派势力扩张,天主教会也决定加速自身改革。可惜宗教改革和天主教自身的改革结果只加深了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最后还是诉诸战争。

天主教自身改革是全面性的,非单教义和教规的改革,还有宗教文化的更新。改革是双管齐下:重科学(强调哲学、实验),也重神修(强调默想、内省)。宗教艺术从文艺复兴时代的灿烂,甚至放纵,回复到平淡、庄重。宗教音乐也从复杂到简单。一般史家都把特兰托宗教会议(Council of Trent)作为天主教回应改革派的挑战而发动的大规模内部调整的序幕。这是天主教会中历时最长和颁布最多文件的会议。为时18年(1545—1563),历经5个教皇。会议的决议如下:①谴责改革派的教义,重申天主教的教义;②改革天主教会的管制和纪律(管制赎罪券出售,整理寺院的清规,加强神职人员的教育等);③强调教会传统的重要性;④重申善功(相对于神恩)的重要;⑤禁止“偶像式”的崇拜。这是强硬的反宗教改革姿态。从此和解无望。其实分裂是无可避免的。这个会议的结果是天主教方面与改革派划清界限并展开自身的改革。

天主教会的自身改革运动于1560年左右开展,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教会栽培大批“开明分子”,结果是他们挑战权贵;教会推广艺术吸引教徒们的虔敬,结果引出“崇拜偶像”的争议,增强了改革派的号召力;教会引入科学,特别是修历,结果引出哥白尼、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论,然后又以宗教法庭控制,制造出信仰与科学势不两立的“虚象”。

在会议接近尾声之际,欧洲的宗教与政治形势如下:法国刚开始30多年的“宗教内战”(Wars of Religion, 1562—1598,见本文“法国之乱”部分),主要是天主教对抗声势日益加大的激进胡格诺派(Huguenots)。在英国,天主教对手是英王亨利八世脱离(被逐)天主教后创立的英国国教^①。稍后,这逐渐演变成为支持国王的国教和支持国会的激进清教徒之争,最终爆发内战(见本文“英国之乱”部分)。在德国,情形就更加复杂。那时,改革运动已蔓延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特兰托会议于1563年刚结束,神圣罗马皇帝费迪南一世就于1564年去世(他是发起特兰托会议的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士五世的弟弟,替哥哥治理帝国多年。查理士于1556年因病退位,把帝位让给他。)他与哥哥都属当时欧洲最尊贵和权威的哈布斯堡世族(Hapsburg,见《源头》一文),当然照顾家族利益。世族之争将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整个

^① Church of England,在英国之外称“圣公会”(Anglican)。教义基本与天主教一样,只是不承认教皇,单尊国王为教主而已。

16世纪和半个17世纪征战连年,民为刍狗,世族之间因宗教改革引来的利益重新分配之争最终毁掉了庇荫它们的封建制度。

马丁·路德的一纸文告引出一场泛欧的动荡。从1517年宗教改革开始到1648年“30年之战”结束,欧洲战乱总离不开西班牙与以西班牙为本钱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世族。下面看看西班牙帝国盛衰对欧洲文明的影响。

欧洲大乱:西班牙的盛衰

西班牙的崛起(见《源头》一文)源于1479年的阿拉贡(Aragon,现今西班牙东面)与卡斯蒂利(Castile,现今西班牙南面)的合并。16、17世纪的西班牙与法国之争是西方第一次的“龙虎门”之争,也是历史异数。这个被史书形容为宗教战争的时代,作为主角的西班牙和法国却同属天主教。到时代结束,这两个国家也没有脱离天主教。两者之争其实是国家(王朝世族)利益之争,甚至连宗教外衣都没穿上。

两国结怨起于13~15世纪争夺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一带。西班牙胜法国败,埋下日后战争伏线。法国在英法“百年之战”结束后,国力逐渐恢复,念念不忘收复失地。1494年到1516年,西班牙步兵屡次击败法国以武士为主的骑兵,建立起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开始成为欧洲第一强国。这是宗教改革前夕欧洲的政治与军事情况。

刚好这时欧洲两位新王出现。他俩之争决定了欧洲从中古进入现代的途径。1515年,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即位(1515—1547)。1516年,西班牙的查理士一世即位,并于1519年被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士五世(在位到1556年,因病退位,1558年去世)。这两位新王刚好在宗教改革前夕即位,他们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再加上他们在位时间比较长,关键性地影响了整个16世纪的欧洲。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统治下的法国在后文中再谈。现在看看这位查理士五世^①的功过。

查理士有4个欧洲世族的血统。他出生于荷兰(当时有17个省份,包括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部一大片和西部一小片),因此对荷兰很有感情。还未登上王位之前,他以勃艮第公爵的身份把荷兰17个省份统一起来治理。因此,可以想象他日后对其中7个省(现今的荷兰本身)要结成“联合省份”去独立是何等抗拒。1519年,他又继承了哈布斯堡世族的奥地利领土。同年,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他发觉宗教改革已在帝国中心的德国各王侯国中急剧发展,很多王侯已改奉改革派。帝国的辖区主要是德国,查理士出生在荷兰,而世族的祖业在奥地利,德国就是在两者之间,因此,他视保持德国留在天主教会内为己任。

因为法国的牵制,查理士先要跟法兰西斯打。法兰西斯虽然战败被俘,但他并未放弃与西班牙为敌。1542年再开战,战情胶着,直到1546年。法兰西斯一世于1547年去世,亨利二世继位。此君能力有限,未能对查理士造成威胁。查理士就一心一意

^① 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在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中的巨变是西方历史分水岭,一般史家都用他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士五世的称号,而不用西班牙国王查理士一世的称号。

以神圣罗马皇帝的身份去处理德国境内的宗教改革了。

在1531年,德国各改革派结为“施马尔卡尔登联盟”(Schmalkalden League以结盟地点的德国中部一个小城命名)。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除了部分地区,德国差不多全属改革派(最低限度是各地的王侯改奉改革派)。为了对抗哈布斯堡世族王朝的“围堵”,法国大力支持这个联盟。1544年,查理士刚击退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遂乘胜追击“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此刻,刚好是天主教本身发动改革,于1545召开特兰托宗教会议,处理教义和教会组织问题(见上)。查理士原想利用这个机会以谈判方式解决宗教纷争,恢复帝国的政治秩序。但改革派认为天主教会没有诚意,有受骗的感觉,战事遂起。1547年在德国的米尔贝格(Muhlberg)一战查理士取得决定性胜利。

1548年,他颁布奥格斯堡御诏(Augsburg Interim),下令恢复天主教,但很多人反对,甚至天主教的王侯们也反感帝国权力太大,罗马教廷也反对,认为帝国侵犯教廷对教义的演释权。因此,查理士未能把德国镇压下去。随后,诸国得法国资助,把查理士的军队逐出。1552年,查理士无奈地定下帕绍和约(以德国南部小城Passau命名),保证宗教自由,取消奥格斯堡御诏的实施。查理士的统一理想破灭。1555年,他与诸国再定下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①。

奥格斯堡和约的原则是“王侯信什么教,侯国就是什么教(不想跟从的子民可以携带财产移居其他侯国)”。当然,这是承认“既成事实”,目的在于维持德国政局的稳定。这个和约其实代表着王侯们(无论是天主教或改革派)如愿以偿,他们可以决定他们子民的宗教。这其实就是一种“绝对君权”,引出日后“子民”对这种“绝对君权”的抗拒,成为从“子民服从君主”走向“人民追求自由”的动力。

诸王侯国权力增加,帝国权力减少。改革派的王侯们取得原本属于天主教会的土地、财产。每个王侯都成了侯国的“国教”之主。就算天主教的王侯也得到好处,因为罗马教廷唯恐他们叛教,下放给他们很多权利。就算当地的天主教会为求自保,也要“收买”这些王侯,免得他们见异思迁,投向改革派。更严重的是,这个和约并没有承认其他改革派,尤其是激进的加尔文派和“再洗礼派”。和约之后,激进的加尔文派在路德派的地盘里迅速增长,互相冲突使情况更趋复杂。因此,奥格斯堡和约的结果是德国更加不统一,宗教之争有加无已。和约的实施马上出现了困难。原先是天主教的主教转成改革派后拒绝把所辖教区归还天主教会,帝国怎去处理?

作为一个“国家”,德国统一的凝聚力也削弱了,因为少了一个共同的信仰。查理士打了胜仗,更作了让步,但宗教之争却变得更政治化、更复杂。米尔贝格一役也把西班牙定位为神圣罗马帝国中天主教哈布斯堡世族的保护者。这样就种下长达差不多一个世纪,到1648年“30年之战”结束才告终的乱根。

^① 奥格斯堡和约的条款包括以下内容:

诸国王侯(约225个)可选择奉天主教或路德派;

在天主教主教辖区内,路德派有宗教自由;

路德派可以保留自1552年帕绍和约以来从天主教会抢来的土地;

从天主教转到路德派的主教们要放弃他们的辖区;

居住在天主教或路德派国家的人不能选择与国教不同的宗教。

查理士于1556年因病被迫退位,1558年去世。继位的腓力二世定要秉承父志。他也是长命的君王(1556—1598)。首先,他于1558年与1559年两次战胜法国。法国被迫承认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主权。1559年,法王法兰西斯二世去世,由王太后摄政。法国政治进入混乱时代。几年之后爆发“宗教之战”,持续30多年(1562—1598,见本文法国部分),再无力与西班牙争雄。这时开始,西班牙进入全盛期(1559—1643)。此际,也是天主教会本身更新最积极的时期。宗教分歧带来的对新知识的探索和开拓是在这时期发芽的。西班牙辉煌和没落的种子也是在这时候播下的。1546年,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大量金、银。这是西班牙辉煌的“资本”。但过度依赖海外金、银也造成忽视国内生产、忽视国际贸易、忽视国家投资。加上以霸主自居,战火频频,造成多次破产。国不泰,民不安。

一开始,腓力把卡斯蒂利作为西班牙帝国基地实在很不明智。西班牙实际上是三个封建国家的结合。阿拉贡、纳瓦拉和卡斯蒂利都是半自主的,尤其税收和司法。卡斯蒂利人口只有法国的1/3,庞大帝国所需兵源经常不足。腓力稍后与英国玛利女王缔婚,意图结合英、西实力。他想借着玛利是英国女王的关系,按宗法两人同时统治英国,并利用英国的国力推进西班牙的利益。但是这只是他的如意算盘。英国是顶不可靠的盟友。最后,还是个难缠的敌人呢!

虽然法国在16世纪上半期不断牵制西班牙,但西、法之争因法国在16世纪下半期的内战(1562—1598)而暂时停止。最后拖垮西班牙是16世纪下半期的荷兰战事,断断续续80年,把西班牙弄得筋疲力尽,最后被法国一击而崩溃。

1556年,腓力二世刚即位,远离西班牙本土但属西班牙帝国的荷兰出现不安。加尔文改革派的激进分子暴动。当时的荷兰虽是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但主要是商人自治的城邦,自由风气很盛,很不服气外人的统治,而且收容了很多从法国和德国逃来的激进改革派,所以乱得很。1566年,腓力派大将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ba)领兵进入荷兰镇压。荷兰诸省中势力最强的柯伦治世族(House of Orange)领袖“沉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有别于日后英国“光荣革命”,被英国迎入为王的同族人威廉三世)拒抗失败。这位被称为“铁血公爵”的阿尔瓦公爵既是名将也是酷吏,为筹军饷抽重税,民心不服(特别是习惯自由的工商业城邦),他以严刑对待,卒酿成全荷兰摆脱西班牙运动的借口^①。这是西班牙、荷兰“80年之战”(1568—1648)的启幕。

本来,荷兰之乱是可以马上平定的。但突然强敌压境,西班牙不得不全力应付,以致癣疥之疾终酿成致命之伤。1565年,奥图曼进犯欧洲,登陆地中海的马尔太岛。被岛上的“圣约翰武士团”(天主教)击退。翌年,奥图曼的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驾崩,儿子继位,是个庸才。腓力认为有机可乘,转守为攻。与威尼斯船舰会兵,联合全欧的“志愿军”,于1571年在希腊西岸的Lepanto港外毁灭了奥图曼舰队。从此,奥图曼的海军在地中海再没有作为。

这是西班牙威望最盛的时期,而腓力也承担了全欧保卫天主教、讨伐改革派的领

^① 有点像多年后美国脱离英国一样的理由:纳税者必须有政治发言权,没有政治发言权就没有交税的责任。在现今的西方,“人”的定位也如此:在政治层面上是纳税人,在经济层面上是消费者。

袖之责。此中,最棘手是荷兰。西班牙军队于1574年包围莱顿(Leiden,现今荷兰之西),荷兰人决堤抗敌,双方僵着。驻荷兰的西班牙占领军有8万人,开支浩大。加上Lepanto一役的军费,以及由美洲运回金银的船只被海盗抢劫(其实都是英、荷、法的半正规海军),西班牙终于支持不住,在1576年破产。驻荷兰军队军饷不足,不久就叛变,洗劫安特卫普,并抢掠荷兰南部各省份。这些从前中立的南部省份遂与北部省份联盟,对抗共同敌人西班牙。西班牙这时只有以谈判解决问题。南部各省于1579年稳定下来(Union of Arras, 1579),但这反而加强了北部各省脱离西班牙的决心,结盟抵抗西班牙(Union of Utrecht, 1579)。

正在此时,西班牙的国力突然倍增。这也是事出偶然。1578年,葡萄牙以十字军名义入侵北非的摩洛哥,葡王塞巴斯蒂安(Sebastian)在战场失踪(有称被杀),王位落入王叔亨利之手。他是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于1580年去世。枢机主教没有儿子,于是王位悬空。刚好在前一年,荷兰南部各省为表示对西班牙的忠诚(见上),接受了腓力委派来的总督,使腓力稍有喘息的时间。他遂趁机去取葡萄牙王位,借口是他的血统最接近。葡萄牙很多人反对。腓力派兵进驻里斯本,葡萄牙“议会”(Cortes)宣立他为葡王。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包括它们的海外帝国,遂归腓力一人统治,直到他死后才再分开。这叫做“一人之内的统一”(personal union)。当然,这也不是没有成本的。驻葡的占领军人数不少,军费也不菲。腓力王庭在1580年到1582年期间还搬到里斯本。

腓力吞掉葡萄牙,但荷兰的“叛省”(北部的7个“联合省份”)却要把他踢走。反叛省份于1581年盟誓抗西,并正式宣称腓力不是它们的皇帝。这可以说是荷兰的独立宣言。这些省份主要是独立的都市,如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帝国的税收中,它们的贡献占很大的比重。这些由商家、豪族组成的自治式政府,多信奉加尔文派。那时,西班牙的1576年破产还未曾恢复过来,加上占领葡萄牙的军费也吃力。1584年,叛省公举的领袖威廉被刺,腓力希望叛乱就此平息。但事与愿违,英国介入。

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见西班牙势力强大,很受威胁。虽然并未诉诸战争,但凡与西班牙对抗的国家她都暗地支持和资助。她更支持英国“海盗”抢掠西班牙舰队。1580年,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攻击西班牙海外属地,回国后被女王欢迎和册封,惹得腓力光火,把所有在西班牙海港停泊的英国船只禁锢,并开始产生兴建“大舰队”(Armada)攻击英国的念头。1585年,伊丽莎白一世支援荷兰与法国的改革派分子,又派德雷克去打击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西班牙船队和海港。这场英、西之战持续时间长达20年(1585—1604)。此中,在1588年,腓力发动“西班牙大舰队”进攻英国。天气、战略和情报救了英国。但翌年,“英国大舰队”的反攻却大大受挫。西班牙的海、陆军力还是无人能及。但西班牙盛极而衰也由此事开始。荷兰、德国乱事未平,英国处处滋扰,它又去打法国了。

法国是西班牙的世仇,当时正在内战(见本文法国部分)。腓力当然希望它越乱越好。1590年,来自荷兰和英国的压力稍松,腓力就分兵驻荷兰的军队去打法国,帮助法国的天主教联盟。那时,法国的宗教内战正处于最后决战阶段,同时世族在争夺王

位。腓力趁机提名他的女儿为法国女王。这位腓力也确实胃口大。他想像吃葡萄牙一样把法国也吃掉。他异想天开地以他的王后有法国世族血统为借口染指刚悬空的法国王位。但这招一出,反惹来法国上上下下的反感,自然未能成功。到1594年法国新王亨利四世即位,历时超过30年的宗教内战总算了结。欧洲进入英、法、荷共同围攻西班牙的时代。

西班牙在腓力登位之后,其财政于1557年破产一次,在1576年与荷兰之战中再次破产,到了1596年因大西洋船队屡次被劫,维持海外帝国费用庞大,又破产了。腓力二世于1598年去世,由腓力三世继位(在位期1598—1621年)。那时,西班牙军力仍是欧洲最强的。但国外树敌多,国内也多难^①,遂先后与法、英媾和(1598年与法国讲和,1604年与英国讲和)。

跟着,西班牙把注意力转到荷兰。其实,从1590年开始,当西班牙与法国纠缠之际,荷兰在“沉默的威廉”的儿子莫里斯领导下,逐个击破西班牙在荷兰境内城市的驻军。西班牙与英、法媾和后,全力对付荷兰,屡战屡胜。到了1609年,眼看要完全摧毁荷兰的战斗能力,但国库空虚,只得收兵,进入“12年休战”(Twelve Years' Truce 1609—1621)。在实质上,这等于承认荷兰独立。西班牙得到难得的几年宁静,可是荷兰的海外商业帝国和海军也乘机大大增强。

休养生息几年,西班牙国力逐渐恢复。腓力三世(在位期1598—1621年)本人才干有限,对国际政治又兴趣不大,帝国的管理都交由首相代劳。1618年,他换了首相。新上任的巴尔退则(Don Balthasar)从前是驻维也纳大使,他的见解是与奥地利(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也是属哈布斯堡世族的地盘)更紧密地结合,阻止法国卷土重来,彻底消灭荷兰叛乱。刚好,1618年,身为神圣罗马皇帝,但以奥地利为基地的费迪南二世在布尔格德发动战争,要肃清波西米亚地区的宗教改革派联盟。巴尔退则唆使腓力三世参战,把驻荷兰的西班牙兵东调,“30年之战”(Thirty-Year War)遂起。西班牙的没落,法国的兴起就以这场战争为转折点。

“30年之战”是无可避免的。这是神圣罗马帝国与其领受的德国内部诸王侯国之间和哈布斯堡世族与欧洲诸国之间的矛盾到达了爆发点引发出来的全欧大战。

德国四周的国家早就对德国的局势极为关注。德国西面的荷兰和南面的意大利都归西班牙所有,这使法国感到被哈布斯堡世族包围的威胁。同时,法国也想扩张自己的势力控制神圣罗马帝国德国境内的各小王侯国。这个特殊的动机驱使属天主教的法国站在改革派一边。北方的瑞典和丹麦则想控制德国北面沿波罗的海诸王侯国。加上16世纪下半段的天主教本身的改革运动制造了西班牙天主教保护者和欧洲霸主的心态,东征西讨,早已令欧洲诸国大大不安。现在,由围堵变为围讨的局面。

“30年之战”前夕,德国地区战云密布。天主教势力组织了“天主教同盟”(Catholic League),推举巴伐利亚(Bavaria)的马克西米连一世公爵为首领。以激烈的加尔文派为主的改革派则组织了“誓反派联盟”(Protestant Union),推举巴拉丁(Palatinate)的

^① 1596年到1602年,西班牙根基之地的卡斯蒂利地区多次被瘟疫蹂躏,死亡50多万人。